

我國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本土化必要性之探討

《曾華源
黃俐婷》

壹、前言

我國社會工作的專業服務方式是採借自歐美社會，其專業性服務目標或理想是希望協助案主因應生活適應問題，並期待能有良好的成長與發展。檢視社會工作專業知識體系和專業哲學之內涵，可知社會工作專業價值強調個人尊嚴與獨立自主的重要性，深信個人有權利和義務追求個人的自我實現，而社會亦有義務協助個人自我實現。專業對問題處置取向是針對探討個人自我功能，協助個人自我覺知，期能增進自我功能，達到獨立自主以因應適應問題。這種取向其實隱含著相當濃厚的西方個人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社會價值色彩，並且符合西方的社會文化脈絡。這種取向和專業知識體系在中國的適用性已有部分學者專家提出質疑（蔡漢賢，一九七八），並且早已有人嘗試提出修正（謝秀芬，一九七七）。然而並未能引起國內社會工作專業同道熱烈的反應，反倒是香港與美國的社會工作

界提出文化差距在實務運用上的影響受到注意，甚為可惜。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目標本在協助社會工作的學生在未來助人工作中瞭解案主的需求與行為，進而提供有效的服務，因此，瞭解案主求助行為背後的社會文化因素對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本土化有其必要性。

貳、求助行為的社會文化因素

文化中會「規定」人們應該和環境之間保持何種適當關係，對「正常」、與「病態」均有定義（余漢儀譯，一九九三）。以「人在情境中」的觀點而言，個人如何表現行為，因應社會生活問題必定受其所處環境影響，所以個人的求助行為，亦要考慮整個社會環境的認同程度，亦即是否合乎其所處環境的文化。例如家庭適當的生活模式中，會指出成員間應有的互動行為，彼此之間的關係與權利義務，何時可以表現情緒，以何種方式，成員間的衝突應如何處

理等等。故各社會文化脈絡中，對於問題的解決方式和目標，均有其規定。在臨床服務中常見國人面對問題處置時，如開刀與否和時辰的選擇；因應先生外遇問題等等；許多人會求神問卜或看黃曆，而且親戚朋友會參與提供意見和實際協助。更重要的是國人常會爲了和諧而不會或不敢有意見。因此，Thomas T.H. Wan (1977；轉引自吳就君，一九八一：二六〇)發現當一個人屬於親切而嚴密的團體時（尤其是傳統式的權威取向家庭），較喜歡採用與其文化信仰方式一致的求醫行爲，而較不喜歡採用其文化中所懷疑的、不信任的醫療行爲。Bastauri 等人 (1971) 研究亦證明社會文化因素是決定採用的醫療設施的重要原因；而在我國，林宗義 (一九八一) 的研究也指出，中國家庭特有的階段制度和實用主義兩項因素，影響選擇醫療的方法。因此，面對問題的態度和求助行爲受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甚深。

在我國社會環境中，因應問題的態度和求助行爲模式爲何？而此模式中又具備那些特性與要素是與社會文化相關聯的？一般而言，國人的求助對象可以包括求醫、求人，求神。吳忠進 (一九八八) 研究指出個案首次求助對象以求人者 (包括各類輔導機構、家人、朋友、師長、同事等) 佔近六成之多，求醫者 (包括精神病及一般醫院、衛生所、中醫醫院等) 佔三成，求神者 (包括問乩童、算命、問卜等) 佔一成出最少。可以見得，個案首次求助的對象以求人者最多，而其中是否以首次求助於家人、朋友最多？假若將求人者之輔導機構抽離出來與求神者比較，是否前者會少於後者？而

再次、多次求助對象的依序爲何？則有待探討。此外，吳就君 (一九八一) 研究指出醫療求助者有六〇% 常採用「複向求診行爲」，即吃西藥又同時吃中藥或求助於民俗醫療，且出現有先後次序或同時進行的模式。因此，目前國內社會，案主之求助行爲似乎具有多元化的特質，而各種不同之求助行爲之採用亦有先後順序和差異程度。此一現象對於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因爲，專業必須獲得社會認可。

除了求助家人、朋友以外，案主還會向誰求助呢？是求醫？還是求神 (即民俗療法)？還是求助於專業助人機構？採用的原因爲何呢？吳就君 (一九八一) 的研究指出民俗療法 (即求神) 中，「童乩」與「收驚」之採用者，主醫療功能，其因精神、身體之痛苦或不適而採用者佔八〇% 以上。而「風水」、「卜卦抽籤」之採用則主信仰功能，其因問事祈福平安而採用者爲最多，佔七十五% 以上。「符水」、「算命」和「看相」之採用則在醫療與信仰二種功能之間，各佔一半 (吳就君，一九八一：四四)。相較之下，醫院則專一於醫療功能、而專業助人機構則較以輔導功能爲主，兩者的功能皆較爲單一。以國人實用主義的思維取向而言，機構的功能必然會影響案主的求助行爲。因此，由以上各種求助對象之功能，可以解釋國人普遍採用民俗療法的原因，可能在於其機構功能較爲多元化、實用性較高，例如，廟宇不但具有可讓人以香灰求醫，以問卜求神，亦有信仰與觀光遊覽的功能，所以人潮很多。在日常生活中，「算命」常成爲人們聊天說笑的話題，且常呈現於國內的電

視戲劇與流行歌詞中。而國內寺廟，除了有抽籤的設置以外，並常見算命攤位；陳李綱（一九九一）指出近年來台灣寺廟急速增加，命相館的攤子也相繼增加；而各地寺廟的香火更為鼎盛，前往求神問卜者亦絡繹不絕，甚至有一些人亦不惜千金趕往一些有名的命相館批命問卜（張春興，一九九一：九十四）。諸如此類的民俗取向求助模式，在國人所處環境中是如此的普遍，可能是因其物理環境與服務方式較符合中國人的文化。例如，求助於廟宇，符合國人認為自然支配人間的宇宙觀，而算命會如此普遍，亦與國人認為冥冥中自有定數的宿命觀息息相關，傳統中國社會為維持農業社會制度的和諧，須藉著某些力量來支配人的行為，以建立權威，因此，可能會藉助一些無法解釋、超自然的方式來尋求指點迷津，解決困惑；且在其中，大都只須在心中向神明訴說，或透過籤詩或神職人員（亦代表神）來得到解答，相較於專業助人機構，則不需向陌生人訴說內心的秘密，較可維持自尊與面子，並獲得安全感與歸屬感。

綜合以上，可歸納出中國人的重家族、講人情、愛面子等社會文化因素均會影響其面對問題和求助行為。此種問題解決取向其背後隱含何種文化特質？國人內在認知、價值與思考模式又是如何？筆者相當有興趣。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也是在解決問題，其對問題因果關係之研判，處置目標之設定，以及如何進行問題處置等，即帶有規範性存在。為能有效溝通和提供協助，瞭解社會文化面向，就相當重要。本文初步嘗試從文化比較之角度，整理中西方生活哲學

與態度，以及社會認知取向差異，期能引發更多有志者的興趣，以做為加強社會工作本土化必要性之催化劑。

參、中西基本文化特質與差異比較

文化被視之為一切社會生活的總體，不僅包括生活習慣，更重要的是對外在世界的一套認知體系。中國最早的想法是把人間的秩序和道德價值歸源於「帝」或「天」，道之大是源自於天，這是價值的源頭，雖然認定價值之源是出於天，但是未能超越走向外在化、具體化和形式化的途徑。要能實現價值理想，則要落實在心性之中，以內心自覺推出一個超越性的觀念，只有通過「盡性」以求「天」；所以，中國人通常在面對事情時是會自省的，要會自己去想，以求取對事物自主的覺知。其內在力量的表現，如儒家強調「反求諸己」、「盡其在我」；大學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亦即透過「止、靜、定、安」求得個人自我的成長和成熟，所以余英時（一九八四）認為中國文化為內在超越的文化型。

由於一切價值是源自於天，中國人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常視「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或「天人合一」之概念外，亦重視人與人的自然關係，強調社會生活中關係最密切的五倫為社會互動的倫理價值基礎，其維繫自然關係的中心價值是安、和與均，而這是常道衝突與矛盾結果不可測，且可能有害關係之維繫，則屬於變

道。

天命的思想影響中國人甚深，儒家認為「命」不可違，所以孔子講「知命」，才不會怨天尤人，安分守己；而孟子講「立命」，人應該努力使「命」成爲現實；人又必須實踐超越本體的「道德規律」，以完成其「天命」或「使命」（黃光國，一九八八，一〇五—一〇六），所以孟子說：「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而道家認爲天地萬物皆是自由自然而生，我們中國人常講「順其自然」「隨遇而安」就是這種哲學；此外，在中國的民間信仰中，佛教算是主流，它主張奏宇奏萬象是變動的，動的歷程是因緣，動的表现是色相，人生不外是宇宙幻想的一種（徐松石，一九九一：五十六—五十七）。總之，儒家較爲積極的行爲可以改善既定的天命；道家相信人是宇宙陰陽和合的自然產品，而佛家則認爲人是緣與和的幻相，六道輪迴不息等，對國人處世與因應生活壓力均有深刻的影響。因此，命既然天已經定了，所以命中有劫數或何時有因緣，可以事前積德或算命來改善或逃避，或可以在事後以比較心平氣和的態度接納。

重視天命的宇宙觀，造成國人在面對問題時抱持著順應天命的態度，亦即盡人事、聽天命，將一切問題訴諸於宇宙最高權威——「上天之意」，以求心安，避免改變引起的衝突。梁漱溟（一九八三：六十三—六十五）認爲中國人面對問題的態度及解決問題的模方式是調和與持中；亦即遇到問題不去要求解決、改造局面，就在現有境地上求自己的滿足；這時介入的地方並不在前面，眼睛並不往

前看而向旁邊看，並不想奮鬥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隨遇而安，應付問題的方法則是自己認知上調和罷了。意即較常作認知而非行爲的改變。西方是傾向第一條路向即本來的路向，就是奮鬥的態度，遇到問題都是對於前面去下手。由中國人所走的路向來看，宿命觀使其在面對問題時常有認知改變的解釋，如中國人常說的「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以調和心理的失落，獲得較好的適應；而現世無法解決的問題則期待來世，所以在遇到特別困難的問題時，常以做善事、積陰德來求心安，並希望趨吉避凶。

西方的生活是以基督教精神爲中心的，認爲人是神創造的，神造的意義是要人成爲享有自由的萬物之靈，順從神的指導，代表神行善於世界上，一舉一動都是爲了榮耀神，這種觀念是相當絕對的。加之，西方的「上帝」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和無所不在的，是萬有創造者亦是西方價值的源頭，上帝和理性是兩個最高的價值，外傾的性格使進步亦成爲其主要價值；「爲真理而真理」、「爲知識而知識」的精神推動著西方科學的進展；強調公平原則，認爲要先盡義務才能享權利；多方面的分析是一種必然觀點，余英時（一九八四）稱爲外在超越的文化型。

綜合而言，中國人的基本價值則是講天命的、重權威的、內傾的、自省的、求和的、安定的；而西方的基本價值則在於自由的、民主的、成功的、進步的、主張個人主義和以人为本主義的。社會工作的價值源於西方，強調個人的權利義務與個人的自我實現，與中國人倫秩序、知命安分的求和個性是不太相同的。在社會工作的助

人過程中，社會工作者所接收的教育訓練是很西方的，所面對的案主是中國人時，是否求助期待與問題解決取向是會受此差異而使助人效果受到影響，值得深思。如社工員強調引導案主的自發性，如親子問題社工員會鼓勵案主向其父母或孩子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情感，然而中國人重權威、講求上下倫理與表達的精神，是否會在引導案主時，有使不上力的困難和處置效果有限？

肆、自我觀念與社會文化

就我國社會文化體系而言，中國人是無我的。嚴格來說，中國人的自我似乎相對更傾向於有意義的他人，而不是傾向於個體自我；個人只是整個社會關係的一部分，而非獨立自主的。在社會互動上，中國人是「採差序格局」之型式與他人做社會互動，不僅把親屬關係視為是至高無上的，而且為人處世之基本原則是要通情達理，而不適合法為最優先的原則。個人不能重視體系外的偶像與他人，感情上亦無法必要離開親人到某個更大的社會圈以尋找人生的意義；在極度憂傷的時候，中國人常在其配偶、家庭成員、或者親友那裡尋求安慰，所以傳統的中國人之自我便具有一種高度的安全感，在危機時刻，他不能完全自立，而是尋求某種堅實的東西，如親人作為依靠。

從公平理論的觀點而言，與陌生人比較，向家人或朋友求助時，因為內心的負欠感較低，向其回報的機會多，較不會有「欠人

情債」的壓力，因此，也比較願意向他們求助。此外，家人、朋友間由彼此較為熟悉與瞭解，亦較能預期彼此的互動並掌握對方行為背後的意義，所謂「家醜不可外揚」，因此，求助於家人或朋友會讓人覺得較有安全感、並可減低困窘，從中可以保有面子與自尊，不會有辱家人，較能獲得家人的認同。吳就君（一九八一）指出求醫行為在每個家庭裡都有其固定的模式。亦即每個家人生病求助對象及求助過程大都相似，所以考慮求助時，家人的認同與否有相當的影響力量。程玲玲等人（一九八九）研究指出我國大學生遭遇困擾時傾向於先向朋友、同學或自己求助，其次是求助於人家只有0.16%及2.17%的學生在遭遇情緒問題、學業、及嚴重心理問題時，會首先求助於心理輔導人員。綜合而言，家人是青少年遭遇困擾時最優先考慮的求助者，而專業助人者的順序列於家人、朋友、同學之後的情形則相當普遍。然而「此種自我」作用於關係約束的狹窄領域內，個人無法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事，以致於中國人大體上都顯示出對於變革較高的抗拒與焦慮（馬塞勒，一九九〇：二六〇）。此外，中國人的自我是歸屬於天的，所以在非物質「事件」的解釋上則充滿寓言風格，保留更多的畏懼感與玄義。

相較而言，西方的自我是個人屬性特質所組成，是個人清楚所擁有的。所以在西方觀點中，個人自我是獨立完整的，具有整合性動機和認知性的；亦即擁有動機性知覺、情緒和判斷的行動中心，因而，成熟是個人能獨立行動和獨處，貶抑對他人的依賴。因此，西方社會中，傾向於維護個體自我而不是去適應他人，並且個人要

獲得高度的自我依賴與獨立而奮鬥（馬塞勒，一九九〇：二五七）。西方不重視對親人的依賴，所以必須擴大其人際關係，都在為同樣的東西競爭，他們都想征服對方，從對方處獲得滿足，這些都來自「個人對自己作戰或對他人作戰」的自我概念。其特徵為分析的、個人主義的、理性主義；亦即西方人習於分解事務、重視個人自由與權利、講求自我決定及自我實現，並將理性主義的模式運用於非物質「事件」的思考觀點，使得神秘和迷信的意味消失。

綜合而言，國人由於缺乏「自我」的意識，而又將「自我」歸屬於天，因此形成以天為依歸的宿命觀。不講求自我的情況下，問題發生時較難運用自我分析、判斷與表達的能力，亦較無意願突顯自我的需求、感受以尋求問題的改善與解決問題，所以在問題來臨時，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人、親友的想法，害怕「家醜外揚讓家人蒙羞」，更易想到問題來臨是天意，是命該如此，因此，在面對問題時，不是直接處理，而是迂迴，消極被動的等待情況好轉，同時，以求心安的觀念渡過難關，而非訴諸積極行動的改變。

伍、思維方式與生活態度

對事物的認知判斷，會和對問題的處置相關。波克特（一九七四）指出西方的認知模式是直線式的，偏向演繹的和分析的思考，強調因果關係和對於實體的感知。中國的認識論及其邏輯的補充則是非直線式的，以歸納的和綜合的型式思考（馬塞勒，一九九〇：

一一八）。

羅勃、趙旭東（一九九五）指出中西思維方式之不同在於「可能的」與「不可能的」，即相對與絕對之別。中國具有「循環出現、無止無終、終有可能」的思維方式，而中國的占卜術一方面提供對未來命運的預測，另一方面提供對此命運的補救之法，我們力求「萬能的」理論卻很難接受「即使是一個好的理論也必有侷限、有所不能」。

這樣的觀念，在哲學上則有「天人感應」和「人定勝天」之說，認為人終有辦法感動上天，此類傾向都與中國傳統的思維體系沒有「不可能」的概念有關（羅靖、趙旭東，一九九五：三八三—三八四）。欠缺「不可能」的思維方式使得中國人在面對問題時更容易被動、模糊、放棄努力而流於認命，不做現況上的分析與探討。

相對應的，西方則具有「明確、終結、不重複、不可逆轉」的直線思維方式。而西方的永動機、煉金術最後明確的被宣告「不可能」。「不可能」的概念在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中表現得十分突出；它使得「不可逆轉」的歷史觀成為可能，它同時使得諸如能量守恒定律之類的知識發展進步，所以面對問題的思考模式和處置方式比較邏輯論證的。

陸、結語

社會工作專業之重點在於協助案主自助以因應日常生活所遭遇的問題（Zastrow, 1992）經由協助個人增進自我能力，運用資源來解決問題，其協助方式是先資料收集再診斷，最後依診斷推出處置方法和進行處置，此種協助方式是強調邏輯論證和理論分析的。而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與哲學強調每個人皆有其尊嚴，均有權利與義務自我實現；此種處置模式及其哲學基礎是源於西方的，與國人對問題處置和適應態度似有所不同。

韋政通（一九八七）、梁漱溟（一九八三）認為中西文化在基本特性上有很大的不同，在思考方面，中國傾向直覺性，而西方則是著眼於理性的；而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之觀點而言，中國重宗教，認為自然支配人間，即冥冥中早已注定，而西方則強調個人權威與自由，認為人可征服自然。就此差異而論，助人專業採取之「專業性」輔導方法或解決問題之方式所隱含之思維方式和生活哲學是與國人不同的。

除此以外，中國人在遇到不易預測結果和處理的疑難雜症時，亦常會求神問卜，此種問題解決取向較為積極、獨立，亦相信人為的力量；然而身為中國人的社工員在實務工作中，往往帶著西方的處置策略及其哲學價值與案主建立專業關係，並進入處置歷程，對於文化上的差異可能不自覺，亦可能自覺而產生內心的衝突，致使處置效果使不上力，所以如何從案主文化中的重要觀念切入實務工作，實為一件刻不容緩的事。

綜上所述，由於案主求助行為之形成因素往往是複雜的，絕不

能以單一因素定論，不論是那類的求助行為，均隱含有深層的社會文化因素；所以從事社會工作者，不僅要瞭解行為形成的個人因素，更須具備文化的敏感度，以使助人的功能更能發揮。因此，從事社會工作者除了肯定與應用原有之社會工作教育訓練之外，亦須對本土文化有所了解並融合在實務工作中，如此更能在面對求助者的問題時，看清其背後的作用力對其適應問題的影響，以才能夠增加社會工作專業效能和工作勝任感。

（本文作者：曾華源現任東海大學社工系主任；黃俐婷為社工所研究生）

參考文獻書目

1. 朱娟瑩 我國大學生求助態度與求助行為之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一九八六
2. 李柏英 大學生求助態度與求助行為及其相關變項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八五
3. 余英時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台北 時報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
4. 余德慧 台灣民俗心理輔導 台北 張老師出版社 一九八五
5. 余漢儀 社工教育中文化敏感之實務教學 社區發展季刊 二十六期 一九七九 頁一六三—一六六
6. 林幸台 大學生求助態度之研究 台灣省立教育學院輔導學系輔導學報 二 一九七九 頁一五五—一七一
7. 吳意玲 國中學生的困擾問題、因應策略與求助行為之研究 台

- 北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三
8. 吳忠進 求助經驗、生活適應及輔導滿意度——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個案評估研究 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八八
9. 吳就君 台灣地區居民社會醫療行為研究 公共衛生 八(一) 一九八一 頁二十五—四十九
10. 洪冬桂 我國大學適應問題、因應行為、求助偏好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師大教育研究所集刊 二十九 一九八七 頁九十—一〇一
11. 韋政通 中國的智慧 台北：牧童出版社 一九八〇
12. 徐松石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香港：浸信會 一九九一
13. 馬塞勒著，任鷹、沈毅、陳剩勇、董平(譯) 文化與自我——西方人的透視 台北：遠流出版社 一九九〇
14. 梁漱溟 東西文化化及其哲學 台北 里仁書局 一九八三
15. 黃光國 中國人的權力遊戲 台北 巨流出版社 一九九二
16. 黃光國 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 台北 巨流出版社 一九八八
17. 黃維憲、曾華源、王慧君 社會個案工作 台北：五南出版社 一九九五
18. 楊國樞主編 親子關係與教化 台北：本土心理學出版社 一九九五
19. 張老師月刊編輯部 中國人的命運觀 張老師月刊 一四(五) 一九八四 頁四〇—五十五
20. 張春興 姻緣路上情理多 台北 桂冠出版社 一九九一
21. 程玲玲 台灣大學生的心理求助歷程之探討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三 一九八七 頁一二八—一三八
22. 程玲玲 中國文化對國人心理問題之歸因與民俗醫療體系之建立的影響 社會學與社會工作 七 一九八五 頁九十五—一〇九
23. 謝秀芬 傳統文化對發展社會工作專業關係的意義 亞太地區社會工作研討會論文 一九九四
24. 謝秀芬 「案主自我決定」原則的再探討 東海學報 十八 一九七七 頁一八三—一九七
25. 董華欣、鍾思嘉 影響大學生尋求專業心理輔導意願之因素探討 中華輔導學報 一 一九九三 頁一五八—一九一
26. 蔡漢賢等著 社會工作方的情化與國際化。中國文化學院社會工作系 一九七八
27. Bashur, R.L., et. (1971) Some Ecological Differential in the use of Medical Service. Health Service Research, 6, 61-75.
28. Cheng, L.L. (1985). The Chinese College Student Help-Seeking and Receiving Process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29. Fisher, J.D.; Nadler, A. & Whitner-Alagna, S. (1982). Recipient reactions to aid: A conceptual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1, 27-54.
30. Zastrow, C. (1992). The Practice of Social Work. 4th., Calif: The Doracy Press.